

胡
壮
麟

英语教育
自
选
集

胡壮麟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

Hu Zhuanglin'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胡壮麟

英语教育 自选集

胡壮麟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

Hu Zhuanglin'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 = Hu Zhuanglin'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胡壮麟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12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5600-7147-3

I. 胡… II. 胡… III. 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3889 号

出版人: 于春迟

选题策划: 刘相东

责任编辑: 刘相东

执行编辑: 史丽娜

封面设计: 袁璐

封面题字: 赵发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4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0-7147-3

定价: 3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批共推出10本,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 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 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丛书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丛书将在推出第一批后,陆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外研社还将推出《国际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的内容必须与英语教育有关,如语言政策、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英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英语教学,以及其他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论文。

四、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和期号(或出版社名)。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如演讲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五、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六、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书后附有作者著述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主 任 胡文仲 李朋义

委 员 胡壮麟 王守仁 石坚 秦秀白 杜瑞清

策 划 刘相东

序

外语界有多位令我敬佩的同事，胡壮麟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交往始于改革开放后赴澳留学的1979年，从1979年初到1981年初我们在悉尼大学同窗两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回国后我们在外语教学领域长期合作，无论是在高校专业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或是在高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尽管工作的内容不断变换，但是我们一直相互支持。我担任英语教学研究会的工作以后，也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

胡壮麟教授无论是在语言学研究或是在外语教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在我国语言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是学界所熟知的，他的著述涉及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理论文体学、普通语言学等各个学科，在几乎每个领域他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研究生层次所开课程之多范围之广为语言学界所少见。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教授在第13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很骄傲地提到了他培养出来的中国学者，其中第一人就是胡壮麟教授。如今，胡壮麟教授自己培养的为数众多的语言学博士正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胡壮麟教授自选集中的论文和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多年来在外语教育方面的理念和实践。我认为，自选集突显了他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的三个特点。

首先，我们注意到他的研究面很宽。我们通常都是专门研究专业外语或是大学公共外语，研究基础外语教育或是本科层次的外语教学，但是，胡壮麟教授的研究和教学、教材工作涵盖了中小学、大学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以及网络教学等多方面。仅从他发表的论文就可以看出，从语言规划、双语教育到大学英语和专业英语，从教学大纲的制订到教材的编写都是他

研究的范畴。他不仅发表看法，而且实际参加教学大纲的编纂和教材的编写。他主持专业外语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的工作，工作量很大，十分辛苦，但是他从无怨言。工作做完了，也不讲他在其中的功劳。似乎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胡壮麟教授在外语教育论述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从不人云亦云，对于外语教育方面的各种问题历来都是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发表独到的见解。例如，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外语教学费时多而收效少，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议论。胡壮麟教授经过调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能笼统地说我国外语教育效率低下。他把我国的外语教育与日本、韩国等国的外语教育做了详细的对比，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谈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一时成为时尚，似乎外语院系都必须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而且对于什么是复合型人才也是见仁见智。胡壮麟教授认为外语院系主要应该培养通才，口径不宜太窄，并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佐证。他认为并不是所有外语院系都有条件或应该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

胡壮麟教授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对于新事物十分敏感，接受很快。对于网络上的各种信息他了解不仅及时，而且应用于他所研究的领域。在一般教师对于网络还相当生疏时，他已经设计了自己的网页。在一次澳大利亚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关澳大利亚文化问题的论文，材料之新令人惊讶。事后我了解到他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网上。由此可见，他的研究方法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这部自选集集中了胡壮麟教授二十几年来对于外语教育的主要论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外语教育的历程和成就。另一方面，他本人勤奋刻苦、献身教育、乐于助人、忠厚谦和的精神也是我国外语教育的一笔财富，对于中青年教师及一切后来者都会有所启迪。

胡文仲
2007年1月

我与中国英语教育

一、我原来不喜欢外语

我在《英语学习》2000年第1期的封面内页上曾谈过学好英语的体会，即在一般情况下可用如下规则描述：“动因+兴趣”→决心→持之以恒→见效。这一段话后来在网上被广泛引用。其实，这是根据我个人青少年时期学英语很不开窍而言的，那时我学习外语的目的很不明确，没有出自内心的兴趣。

我1933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学习英语。为什么要学英语？我没有好好想过，似乎哥哥姐姐是那么学的，我也跟着那么学。学得怎么样？惭愧得很，我对小学那一段，印象不深。一方面年幼，小学三四年级时，我才七八岁。一方面日寇占领上海后，强迫以日语课替代高小学生的英语课。同学中有背不出日语五十音图的，日本老师就要打耳光。至今脑子里那位凶相毕露的东洋人以及“阿衣乌埃奥”的语音，比已经毫无印象的小学英语老师以及“爱皮西地”的语音更强烈一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对学外语总有一种无比恐惧的感觉，尽管我没有挨过耳光，那只扬在半空中的大手令人战栗不已。

1944年秋，我升入中学。在当时情况下，人们都以进教会学校为荣。不同背景的教会学校各有侧重，如圣约翰大学着重英文，震旦大学教的是法文，同济大学则以德文见长。这些学校的附属中学，以及圣芳济中学、徐汇中学、中西女中、清心女中、培成女中、圣玛利亚女中、晏摩士女中等都是从初一便开始以英语、法语、德语等授课的。每个学校都有外国老师，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应有尽有。我所念的是一所欧洲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圣芳济中学，原名圣芳济书院，英文名特别绕口，叫做 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在虹口校区的通称外国圣芳济，主要面向外国侨民，也招一些就近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李宗华教授便毕业于该校；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校区在法租界的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一般叫做圣芳济中学。

圣芳济中学除国文、音乐、体育和公民课外，英语、算术、化学、物理、代数、几何、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主课都用英文讲授，如初一算术课学的是英制的度量衡。每天都要背 1 个 pound（英镑）等于 20 个 shilling（先令），1 个先令等于 12 个 penny（便士），1 个便士等于 4 个 farthing（法寻），在换算时，我总是被这种直到 1971 年才废除的英国旧币制搞得晕头转向。地理课则死背 Washington（华盛顿），Seattle（西雅图），Chicago（芝加哥），Rocky Mountain（洛矶山脉）等地名山名。我们的外籍老师是一些天主教会的修士，俗称“相公”（Brother，如 Brother Pastor，Brother Vincent 等），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德国人、法国人、匈牙利人，因为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信徒较多，当修士的也多。英语对这些老师来说，也是外语，因此我至今未能摆脱这些修士的浓厚的欧洲腔英语。高中时的英语课本主要为 Lamb Charles 和他姐姐 Mary Charles 合编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 和美国散文家 Washington Irving 的 *The Sketch Book*。语法书是为印度学生编的 *Nesfield Grammar*。中国教员中水平最高的应数陆佩弦先生，解放后在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以研究密尔顿闻名。另一位是童鉴青先生，解放后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

像日语一样，我对英语也不感兴趣。我对语法更缺乏认识，特别害怕填介词的练习和考试。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的英语书法在班上得过第一，那是用蘸水笔按十七、八世纪的花体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工工整整地写的。其次，几乎每堂课都有听写测验，这对我的听力和拼写很有帮助。家中有一台美国名牌 Underwood 打字机，我对这种机械式训练居然能够接受，因此我的打字速度和正确率数十年来在各单位总是居于领先地位。我曾经向友人夸口，如果没有性别歧视的话，我是胜任打字员工作的。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高中时整理的笔记本，居然每一个英语生词或短语都是自己用英文整理的。

抗战胜利后，到处放映美国电影，有原版的，有中文字幕的，也有另掏钱租的“译意风”，即今天从耳机里听同声传译。一些高班同学常去看，这对提高英语听力很有帮助。一位高班同学曾说他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玉女神驹》达 7 次之多，我非常羡慕，但我家在徐家汇，附近没有电影院，我年纪又小，去得不多。再者，我稍积攒一些零花钱，宁愿逛书店买书而不看电影，现在看来孺子不可教也。

上海 1949 年 5 月 25 日解放后，我快念完高二。全年级同学联合起

来，以准备考大学为名，把英文课给废掉了，这正合我的心意，因此我中学实际上只学了5年英语。尽管如此，我自己买 *Beijing Weekly* 看，学习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词汇。

从英语教学看，由于是欧洲教会办的学校，洋人自己的语音不纯，数理化课程都用英语，影响一部分学生（包括本人）对这些课程的理解和掌握。我印象最深的是1950年报考华北区统招时，省立上海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分别有60多名和40多名学生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圣芳济中学只有8人，而且其中3人考取的是外文系。直到解放后，我才明白原来这是典型的买办教育。但事物有时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解放后，我发现外交部和外贸部中有些领导和翻译，各高校的资深英语教授不少是从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圣芳济中学、中西女中等学校毕业的。

二、外国语是斗争武器

1950年我中学毕业。暑假报考了华北统考的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东统考的国立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上海的私立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和私立沪江大学英语系。我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考新闻系是我的志愿，我一直想当一名新闻记者；尽管我不喜欢学英语，考虑到我中学的数学和物理学得更不好，考大学时只好发挥教会学校的英文“优势”，其次亲友们劝告我如果要当萧乾那样的名记者，英语非好不可。于是凭高二的英语水平，与班上两位同学一起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英文组。在酷暑下，我奋战4个考场，居然被4个学校都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英文组。我抛弃了自己的志愿——新闻系，选了自己不感兴趣的英语，是有原因的。首先清华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工作组曾向我宣传清华大学即将成立新闻系，届时我可以转系，才使我放弃了复旦的新闻系。其次，何其芳在《画梦录》中那种满城黄沙和悠慢的驼铃声的诗情画意太迷人了。

我中学同学中，有3人都被清华外文系录取了。另有两位同学分别考上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外文系。最近，李赋宁先生告诉我，清华的这份录取名单是他圈定的。我的英语不很“成熟”，但我在考生中年龄最小，有培养前途。²

一进清华园，老学长们便向新生不断进行“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的革命教育。这时，我才知道外语原来是外国人为了在中国培养洋奴和买办的工具，如今，可以调转枪头，成了与帝国主义

斗争的武器。当然，心中也有发懵的时候。同是外语，学俄语的学生，总觉得他们才是革命的，而我们学英语的，都是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公子小姐，思想没有他们进步。这种低人一头的情绪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我发现，党组织对那些俄语翻译们正在进行反修教育，后来又听说大学里大批学俄语的学生改换专业，这时，才有一种学俄语的和学英语的彼此彼此的幸灾乐祸的感觉。

我在清华大学学了两年，1950 年秋至 1952 年秋。老师有解放初期的海归派，在耶鲁大学深造的李赋宁先生，他连续两年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翻译老师有著名的希腊文学专家和翻译家罗念生先生，第一次就让我们翻译公元前伽太基的一员名将 Hannibal 的传记片段；口语老师是归国华侨徐锡良先生；语法课老师是老清华的杜秉正先生；俄语是李相崇先生和一位白俄老太太；助教为何士侯先生；教大一国文的是已故的朱德熙先生。

清华的外语教学有不少特色。首先，教学中要求最严的是写作文，不论是李赋宁先生的英语，或是朱德熙先生的大一国文，每两周都得写上一篇。过了二十多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时，李先生曾非常内疚地说：“这批学生三年中没让他们写过一篇作文，真对不起他们。”当然，李先生不必为此难过，因为他那时是靠边站的，对教学安排作不了主。³ 李赋宁先生的思想在为我《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一书所写序中有更清楚的反映：

1950 年我从美国耶鲁大学归来，有幸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教书，结识了胡壮麟同志，当时他只有 17 岁，是外语系一年级新生。我一连教他们那个班英语精读课两年，狠抓了一下英文写作训练。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因为英文写作是科研的最重要的基本功。

第二，学生听课很自由，那时清华聘请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先生给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讲“新闻学”，我这位外文系一年级的小阿弟居然与中文系毕业班的学兄学姐平起平坐，毫不胆怯。我对有关 news 是 north, east, west 和 south 的首字母联想很觉有趣，虽然从词源学上 news 是从拉丁语 nova 的复数形式 novus 演化而成。

第三，班会自发地举行较多课外活动，口笔语并重。如不时开展口语运动，鼓励大家操练口语；也定期编英语墙报。我没贡献多少稿子，

但每份录用的其他同学的稿子都体现了我的劳动，班会让我负责打字。我总觉得，学英语单靠老师，单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如果让学生自觉地操练，会取得更好效果。

第四，清华已有较先进的教学设备，老师为我们录音，我有生第一次品味自己的蹩脚发音。

第五，教学领导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我第一学期年幼好玩，逛王府井、踢足球、打桥牌，周末去西四天主教礼拜堂与辅仁大学的学生教徒辩论人是从猴子进化的；上课时不认真听讲，做小动作，以至脾气很好的李赋宁先生忍不住常盯着我。至今回想起来，李先生的眼神既有威慑力，又有感化力。第一学期末系主任吴达元先生专门找我谈话，端正我的学习态度，我多少有所触动，表态要用功学习。

事与愿违，我在学习上仍然没花太多功夫，我和同学们投入了谁都无法预料的各种政治运动。先是抗美援朝运动，敲锣打鼓，去北京郊区宣传。接着是参军（我第一次因家里反对，没有报名；第二次报名装甲兵部队，未被录取）、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我在北京和上海工作了五个月）等运动。1952年的暑假经北京市委批准，我和一些同学分别去石景山钢铁厂和长辛店二七机车厂蹲点劳动。我去了二七机车厂，作家邓友梅也在蹲点，他在如何向二七老工人学习，如何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上给我帮助很大。

原定一个月的下厂锻炼尚未结束，便奉命撤回，去和大报到，参加解放后全国第一次最大的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我和班上一部分同学虽然只念了两年大学，在实际工作中与各地大学毕业生相比，程度不算太差。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提高了我们的口语能力。唯一遗憾的是我为最大的印度代表团做生活翻译，每天被灌输的是印度英语，像 youth 这样的词，念成了 /ju: t/。由于我常要扶着团长 Kitchlew 博士行走，代表团成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说我是他们团长的 walking stick。在此期间，我陪这位团长访问过宋庆龄、郑振铎、华罗庚等名人。有次陪 Kitchlew 博士去宋庆龄先生宅第访问，宋庆龄先生不知道我是上海人，用上海话告诉她的保姆“阿妹，给这个小囡五角洋钿买碗面吃。”我也曾向新西兰友好人士 Lewi Alley 请教过速写。

三、要做一名三好学生

就在我们参加亚太会议的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震

荡。为了学习苏联的专业化办学经验，像清华和交大等学校改成理工大学，像北大和复旦等大学改成文理科综合大学。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在开学后统统转入北京大学，与老北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西北大学的外语系学生合成一系。我和一些同学因为参加亚太会议，行李都是由留校的同学代为打包搬到新校址的。

亚太会议结束后，大部分同学上新北大报到，我又接受一项新任务，为印度共产党的一对夫妇当翻译。他们两人都是印共中央委员，女方要参加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学习中国的妇女工作经验。我们走进妇联机关大门后，操场上坐满一大批较年轻的妇女工作干部，突然一位年青女干部在人丛中大声叫我的名字。我们四个月前还在上海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工作队时一起工作过，作为一个才 19 岁的男孩子，在上千位女性众目睽睽之下，难免又紧张又害臊，两腿发软。进报告厅后，我很高兴见到蔡畅、邓颖超、帅大姐等领导同志，但是会议开始后，当我翻译到街道委员会、里弄组织、结婚离婚复婚重婚，以至例假、女用卫生巾等妇女专题时，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当天晚上向领导提出换一位女同志来翻译，我终于在 12 月份回到北京大学报到，投入我最后一年半的学生生活。

我非常高兴，学校通知我入三年级甲班学习，甲班的程度略高于乙班。我也很清楚，李赋宁先生在协助新班主任俞大纲先生分班时是要对清华这批学生作介绍的，他一定为我说了好话。不久，期末考试，成绩还居中游。

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分别为俞大纲先生和赵昭熊先生，翻译老师为潘家洵先生和张谷若先生，报刊选读由钱学熙先生教，口语老师为美国华侨伍鸿声先生，课外阅读为徐华樑先生。我的选修课程主要有王瑶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王铁崖先生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以及马列主义等课程。

我在北京大学最大的收获是明确了学生的职责。我 1952 年 7 月入党，先后任合校后的中西俄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中西俄团总支委员、西语系团总支书记，思想上一直认为革命工作最重要，因此对学习不重视。来自原燕京大学的女生给我起了一个外号“fooling”，取“fooling around”之意，即到处晃荡，不务正业。1953 年春毛主席发表了“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的指示。以胡启立为首的校团委组织我们团干部学习，狠批我们的“万金油干部”思想，要我们在学习上带头，而团总

支干部又要要在全体团员前带头。这对我真是一个难题，我每天下午有两个小时的社会活动，比一般同学少学2小时，而晚上要遵守纪律按时熄灯，早上要与同学同时起床出操，加之本来基础就差，岂非强人所难？其他团干部也有想不通的。于是出现期末考试后，二年级团干部因考试成绩不好，关起门来集体号啕痛哭的事件。我总算还能克制自己，除上课时尽力思想高度集中外，一有时间就往图书馆占位，课外把中学的 *The Sketch Book* 和一些小说认真阅读一遍。我还托低班的香港同学陈兆华女士从香港买回1952年版的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与同学们大吹英语词的词源，颇具老学究的姿态。从今天的认识看，如果我买一本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似乎更为实用，这部词典常有贴近生活的句例。同班同学中有不少英语学得非常好的，如公认李家骅同学能够写出具有 Dickens 风格的文章，和我来自同一中学的黄用仪兄有 *grammarians* 之雅号。我也看了一些外国报刊，想和钱学熙先生一样，学习英国工人刊物 *Daily Worker* 的风格。有一次，我从报上注意到广告中把情态动词 *must* 作名词用，于是在我的作文中也用了，结果给老师划掉了。我心中倒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有根据的。现在 *Cobuild* 词典已列入 *must* 作为名词的词条，其解释为 “a thing that you strongly recommend”，举例为 *This book is a must for all science fiction fans*。显然，老师划掉是应该的，因为我还缺乏语体的概念。*must* 作为名词一般用于广告语篇。

俞大纲先生的精读课在国内享有盛名，不时有兄弟院校的老师前来观摩听课。教材为从苏联引进的 *The Advanced English*。俞先生对 *active words* 的处理摆脱了传统的词汇教学法，而是让我们当堂用口语就一定量的活用词编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或连贯的描述，可以说她早就具有语篇语言学的思想了。

李赋宁先生来北大后已不在我班任教，可对我的学业仍非常关心。在四上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我，要我把我的全部作文拿到他家，返回时给我如下的评语：

胡壮麟：

文章优点是思想内容充实丰富，表现手法含蓄有力，以“小东西”一篇为最精彩。缺点是文章尚不够流畅自然轻松，主要原因是英语掌握尚不够好，应努力多读、多学有用的 *phrases* 和 *idioms*，尤其是注意这些正确用法，要学会用得恰当自然，多注意文字的语

气，多朗诵好文章，学习好文章的流畅。

李赋宁

在北大学习期间，班上两位同学吵架，对我影响颇深。一位解放前曾在北平美童公学（相当于今天的国际学校）学习过，讲英语像以英语为本族语者一样地道，但他的作文在班上并不领先；一位同学来自上海，成绩中上。前者利用自己的优势，用英语争论，后者不甘示弱，也答之以英语，你来我往，双方不分胜负。事后，我问那位上海同学，您吵架时英语怎么讲得这么溜？他说，我是被逼出来的，坚决不让他的英语压倒我。看来，这位上海同学较强的书面语在关键时刻居然能转化成口语。基础扎实确实重要。究竟是“听说领先，读写跟上”，还是“读写领先，听说跟上”，似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语言既然有形、音、义三个层次，听说读写是互补的，不宜切分过细。

临毕业前有一个小插曲。我进入北大四年级时，政治辅导员严宝瑜先生曾告诉我作好毕业留校的准备。不料最后一个寒假时，西语系不回家探亲的学生组织联欢活动，有一位二年级学生模仿一位教授用无锡话讲课的模样，惟妙惟肖，引起哄堂大笑。这位老师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教师党支部让学生党支部严肃处理，学生党支部又让我作为团总支书记代表全体学生在教员大会上向这位老师赔礼道歉。我执行了，但思想上不很通，高高兴兴的一个春节联欢会，没有必要搞得如此紧张。我又想到班上一些英语好的同学喜欢给年轻助教问一些怪问题，使他们下不了台。于是我做出坚决不留校的决定。直到今天，我才认识到方言有优势方言和劣势方言之分，与上海方言相比，无锡话和苏州话偏软，特别是男士讲吴语，给人以“娘娘腔”之感。再用娘娘腔讲英语，其效果不堪设想。这位老教授接受不了学生的模仿，是可以理解的。

四、在工作岗位上学习

1954年我参加工作分配，按第一志愿在解放军总干部部参军，分配到总参二部工作。我在二部最初为见习翻译，第二年转正，第三年调任参谋，有一份材料受到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好评，转发毛、朱、刘、周、陈的书记处批阅，为此立了功。正是这个经历，我不太同意在学校里过早地提复合型人才，因为如果说英语专业不是专业，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何况谁能很有把握地预见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呢？其次，

我们今天总算认识到 1952 年学苏联搞专业化院系调整欠考虑，那么，今天说英语不是一个专业，英语专业学生要选一个方向，岂不是比 1952 年的专业化更方向化了吗？我认为大学应注意通才教育、素质教育，使学生有很好的基础知识和适应不同工作、善于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事实上，国家规定，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一年见习期。就我个人的情况看，我没有在学校学军事，毕业后，经过一年的“见习翻译”的实习阶段，不是一样干得很好吗？

总参二部注意对干部的培养，就英语而言，专门请了一对从美国回来的夫妇给我们上课，内容有阅读，有写作，有翻译，使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能继续提高。我的另一个体会是要做好工作，英语水平固然要高，政治修养、综合分析能力、中文水平和健壮的体格都很重要，为此，我非常感谢清华北大的政治老师、中文老师和体育老师。经二部政治部批准，我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在全部军人中传阅，我的一些论文在部队刊物和墙报上发表。这些都是上大学学到的基本功。

二部工作有不足之处，那是由于出身的问题，我们很难有机会到驻外武官处工作，很难使用上口语。也有例外，我的中学同学，外号 *grammarian* 的黄用仪兄在北大念到三年级后便提前毕业，调入二部。他因英文水平较高，常有机会被借调，如去外贸部参加与荷兰商人的谈判；担任过叶剑英元帅访问缅甸的军事代表团的翻译；参加八大的英语翻译，当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先生的助手。他对政治词汇非常熟悉，又被老先生们称为 *walking dictionary*。1956 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俞大綱先生和李赋宁先生都曾动员黄用仪兄报考，我也鼓励这位后来成为我姻亲的老同学试试，不料部队不同意，此事告吹。⁴

我离开部队去北大荒下放改造一年半后，被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虽然我未念过农业大学，但我对工作还是很快适应和熟悉的。我在清华学的俄语帮助我从俄文期刊上找到材料。20 世纪 60 年代困难时期，室里举办日语学习班，我又跟一位也是从北大东语系毕业的同事学习日语，从日语找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我总觉得就外语而言，有些科技词汇是相通的，有些语法概念的适用性很强。这使人未免考虑学习外语究竟为什么？有人说，学外语是为了交际。如果交际仅仅指口语交际，我什么也干不了，如果听说读写译等技能的运用都是交际的不同手段，就会有大的交际空间。特别是今天从书本和网上找信息，那么一

定的词汇量和一定的语法知识会让你受用不浅。和在部队的经历一样，独立工作的能力、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甚为重要。

五、重做北大人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干校呆了4年。这一段时间与外语有关的工作有二：我带到干校的书籍中有一本小说是原美国共产党总书记 Howard Fast 写的 *The Path of Thunder*。有一位红卫兵把我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因为该书作者据说成了修正主义分子，而我也成了修正主义的追随者。第二件事是 Howard Fast 的书不能看了，我带去干校的还有订了两三年的外研社的《英语学习》，这就成为我晚上唯一的英语食粮。在干校最后几个月中，我几乎把那几期的《英语学习》每一页每一个注都看遍了。这对复习和巩固我的英语基础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英语学习》的撰稿者都是我的老师。

由于周总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原单位的红卫兵不得不让我从干校毕业。新华社和中国科技情报所都发了商调函。前者是我梦寐以求的新闻事业，后者我有多年工作经验，驾轻就熟。遗憾的是红卫兵坚持于1972年12月把我“下放”到“文化大革命”后由北京市领导的母校北京大学工作，后来证明他们下了一着放虎归山的臭棋。

漫步在未名湖畔感慨万千，1954年我是不想当老师离开北大的，现在为了混口饭吃，养家糊口，竟然要当教书匠了。尽管我看了一年的《英语学习》，自愧水平还是太差。于是向教研室主任言明，给我一些时间准备，待寒假后正式开始上课。想得很美，其实不然。一位教陆军班的老教授没上几天就病了，系主任突然通知我去代课。刚巧这是练习课，有不少是填介词练习。看见我面露难色，教研室主任临时塞给我一张练习题的答案，这堂课的结局可想而知，正如同学们所说，有些空格可以不止一个选项。这一次经验使我认识到，老师一定要放下架子，教学相长，前人早已观察到了。如果总以为自己比学生高明，一旦发现并不如此时，必然给自己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我第一次去燕东园拜访李赋宁先生时，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大有在外晃荡多年，一事无成，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在一次教员会议上，说自己到北大来教书有些“滥竽充数”。不料，有位老教师事后记住这句话，老抢在我前检查说她是“滥竽充数”，更使我无地自容。

在1973年的春季学期中，我正式参加了邓懿先生领导的教学小组，